

比较

NO.5, 2011

56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青木昌彦

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及中日制度演化

许成钢

从体制认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德怀特·珀金斯

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

埃里克·马斯金

问责制与宪政设计

神取道宏

经济学理论和现实

霍米·卡拉斯

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应之道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人民币进入SDR篮子的意义、前景和对策

米盖·阿凯奇

非洲国家对政府权力的制约

保罗·马霍尼

美国证券法的发展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比较

No.5, 2011

COMPARATIVE STUDIES

56

吴敬琏 主编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第 56 辑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086-3032-8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6602 号

比较·第五十六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29mm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3032-8/F·245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96-0110

<http://www.caing.com>

010-58103380

E-mail: service@caixinmedia.com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主管 中信集团

主办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主编 吴敬琏

副主编 肖梦 吴素萍

编辑部主任 孟凡玲

编辑 包敏丹

封面设计 李晓军 / 美编 杨爱华

经营部

总经理 吴传晖

执行总经理 齐晓红

总经理助理 李大巍

华北客户总监 胡蓉

整合营销总监 周轶

品牌外播执行总监 马玲

法律顾问 萧瀚

独家代理：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8610) 85905000 传真：(8610) 85905288

广告热线：(8610) 85905088 85905099 传真：(8610) 85905101

电邮：ad@caixinmedia.com

订阅及客服热线：400-696-0110 (8610) 58103380 传真：(8610) 85905190

香港地区订阅热线：(00852) 21726522

订阅电邮：circ@caixinmedia.com 客服电邮：service@caixinmedia.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号温特莱中心A座16层（邮编：100026）

卷首语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由此带来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处在了一个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后发优势将逐渐消耗殆尽，依靠大量资源投入以及单纯的技术模仿和引进，将无法继续维持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在此前阶段表现良好的那些做法和经济制度不仅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情况，而且很有可能带来一系列困难、矛盾和挑战。只有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形成新的增长模式，才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剖析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找到这些制度根源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机制。本辑《比较》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角度，选择了一组文章，供读者诊断问题、思考对策时作参考。

开篇青木昌彦的文章是他在2011年7月北京举行的“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的主席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将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连续的阶段。然后，以中国和日本为例，探讨了两国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性制度安排，以及这些制度安排对发展阶段转变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他看来，“各经济体的发展过程存在共性，所以我们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发展所涉及的问题，但是各经济体在发展阶段的起始时间、持续时间和制度形式上都存在差异。为了理解这些差异，就有必要对经济、人口与制度之间的协同演化进行比较分析。”

许成钢的文章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如内需不足、经济不平等、产业升级困难、中小企业发展困难以及环境恶化等，都源于一个共同的体制，他称之为“分权式威权制”。这个体制遗传自历时两千年的皇权帝制，虽然在改革过程中也朝着市场化方向有一些进步，但基本特点并无变化。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转变，大量经济社会问题超越了GDP范围，这个体制就必然成为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改革这个体制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向法治转型。

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和亚洲经济。在这篇题为《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的文章中，他利用自己在韩国的经历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研究，探讨了中国经济学者，尤其是那些由西方培养的经济学者如何研究中国经济。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学者需要将研究重心放在结构性转变这一真正有意义的重大问题上。在研究策略上，他强调着眼于中国未来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深入彻底理解制约结构性变化的制度、法律或其他因素；不要随意利用现有

数据草率进行回归分析和计算；要有国际比较分析的框架等。这篇 2002 年的文章，至今读来依然富有启发性。

“前沿”栏目的《问责制与宪政设计》，是 2007 年诺奖得主马斯金在 2011 年“亚洲法和经济学年会”上的演讲，试图运用机制设计理论，来探讨理想的政府官员问责制。文章根据决策任务的不同分配方式，区分了公众直接决策的直接民主制、官员需要问责的“代议民主制”以及不需要问责的“司法审判权制”，然后利用一个三阶段模型，分析了这三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的优劣。这对于我们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经济学理论再次饱受脱离现实的诟病。然而说明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为什么现实会与经济学理论产生系统性偏差。日本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新生代经济学家神取道宏，在其提交给国际经济学会第 16 届全球大会的论文中，试图阐释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他借用三个自然科学的例子，结合行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两个博弈论案例，来说明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一文摘自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和世界银行首任驻华首席代表林重庆牵头的国际专家团队为“十二五”规划提供的研究报告《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文章以全球经济结构的几次重大变化和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正反两方面案例为背景，全面论述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当前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中，特别提款权（SDR）是不可回避的话题，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尤其是人民币是否应该进入 SDR 篮子，更是讨论的热点话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基于此背景，对人民币进入 SDR 篮子对国际货币体系和中国自身发展的意义、人民币是否在可预见的将来有资格进入 SDR 篮子、中国对此面临哪些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长期以来，研究非洲的学者都认为，非洲的政治体制可以通过非正式制度而不是正式制度来解释。然而，肯尼亚法学家米盖·阿凯奇通过对非洲各国政治权力的研究发现，导致非洲国家赋予政治精英过多自由裁量权的恰好是正式制度。因此，要想有效制衡政府权力、提高公民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度，改造赋予政治精英权力的正式法律至关重要，其中也包括改革行政法。

在“法和经济学”栏目中，美国法学家保罗·马霍尼以美国证券法发展为案例，说明了证券法的功能：通过提供标准化的权利和义务来促进市场各方之间的缔约活动，通过限制合法可用的条款来约束缔约活动，从而解决由外部性和投资者非理性造成的市场失灵。

目 录

Contents

第五十六辑

- 1 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及中日制度演化 青木昌彦
The Five-pha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China and Japan
by Masahiko Aoki
- 25 从体制认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许成钢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Structural Problems
by Chenggang Xu

海外特稿

Special Feature

- 40 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 德怀特·珀金斯
The Challenge China's Economy Pose for Chinese Economists
by Dwight H. Perkins

前沿

Guide

- 50 问责制与宪政设计

埃里克·马斯金

Accountability and Constitutional Design

by Eric S. Maskin

IEA集萃

Focus on IEA

- 66 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三则譬喻的启示

神取道宏

Theory and Reality in Economics: Insights from Three Allegories

by Michihiro Kandori

新书架

New Books

- 86 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应之道

霍米·卡拉斯

China's Transitions to A High Income Economy: Escap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by Homi Kharas

金融论坛

Financial Forum

- 120 人民币进入SDR篮子：意义、前景和对策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RMB's Inclusion in the SDR Basket: Implications, Prospects and
Responses

by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140 非洲国家对政府权力的制约

米盖·阿凯奇

Constraining Government Power in Africa

by Migai Akech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152 美国证券法的发展

保罗·马霍尼

The Development of Securities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Paul G. Mahoney

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及 中日制度演化

青木昌彦

2010 年，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实际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总量超过了北美与欧盟。根据麦迪逊被广泛引用的估计结果，这些经济体在 1820 年同样组成了当时最大的经济区，创造了超过 1/3 的全球 GDP 总量。^①然而，它们的份额在 20 世纪中叶下降了 3/4 多，接下来就相继出现了日本奇迹、亚洲四小虎奇迹，以及当前的中国奇迹。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区域从过去的高度急剧坠落，之后又获得了新生？东亚是否有独特的因素？这些经历对未来的发展又有什么启示呢？

为了解释人均 GDP 随着时间变动以及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运行机制，发展经济学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直致力于检验技术与人口之间的内生联动作用的影响。他们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在很长的人类发展历程中，新创意（ideas）伴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发展（例如参见 Lee, 1988; Kremer, 1993; Jones, 1999）。但是在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国家，技术进步的成

* 本文是 2011 年 7 月 4~8 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经济学会（IEA）第 16 届全球大会的主席演讲。衷心感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CDRF）的 Beth Gary 与 Wenmeng Feng，以及之前供职于东京财团比较制度研究（VCASI）的 Yoko Yamamoto，感谢他们出色的编辑工作和对研究提供的协助。

① 中国、日本与韩国三个国家的综合产出在 1820 年世界产出中所占份额为 36.6%，西欧占 23.8%。当时美国所占份额仅为 1.8%（Maddison, 2006）。东亚所占份额到 1950 年下降为 7.9%。

果都被导向了人口的增长,由于农业技术的规模报酬递减,所以并没有促进人均 GDP 水平的提高。这一状态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均衡(例如 Hansen 和 Prescott, 2002; Clark, 2007)。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种状态缺乏活力。

随着新创意的状态越过某一临界点,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摆脱了土地的限制,供给就变得有利可图,实物资源与人力资本开始被重新配置到城镇地区的工业革命兴起(例如 Jorgenson, 1961; Galor 和 Weil 2000, Hansen 和 Prescott, 2002)。同时,在西欧的附庸国(offshoots),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移民涌入带来了劳动适龄人口的增加。这种由人口迁移导致的人均 GDP 增长被称为人口礼物(例如 Bloom 和 Williamson, 1998)或在东亚被称为人口红利。然而,持续的技术进步将导致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偏好,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和/或成本的增加(对于父母来说),于是,人们倾向于生育更少的孩子(参见 Becker、Murphy 和 Tamura, 1990; Galor 和 Weil, 1996, 2000; Lucas, 2002)。人口转变导致了现代增长机制,在其中人均 GDP 增长是靠卢卡斯—罗默技术维持的,如果没有卢卡斯—罗默技术,则增长速度与之前转变阶段的增长速度相当。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接下来我将对此进行简短的讨论。

从马尔萨斯状态向现代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变常常依据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典型事实来模型化。然而,新方法的理论创新在于将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理解为连续的正常发展过程,而不是由不同变量所决定的不同均衡增长路径(参见 Galor 和 Weil, 2000; Hansen 和 Prescott, 2002; Galor, 2011)。从这种统一连续的角度(unified perspective)来看,东亚奇迹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奇迹,而是一种追赶现象(Bloom 和 Williamson, 1998; Ngai, 2004)。为了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发展过程,我们也许希望知晓为什么不同经济体(比如说西方和东方,或者同处东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连续发展阶段,在时机、持续时间和制度形式上都存在差异。此外,从这些差异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以揭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在正式讨论之前,我将首先依据 GNP(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人口以及人口年龄构成及其在部门间分布的数据来划分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发展阶段。此时我们撇开制度形式。根据标准的方法,我将从经济发展的马尔萨斯阶段(以下简称 M 阶段)开始,在这一阶段,农业就业率较高,一般来说在 80%

以上,^① 人均收入维持在较低水平。根据这一简单的标准,将中国的晚清时期、日本的幕府时期与韩国的朝鲜王朝后期 (late Chosŏn Dynasty) 等发展阶段划分为 M 阶段几乎没有多少争议。

阶段划分的一个难点源于确定向后马尔萨斯阶段转变的起始点。对于日本来说,人们通常认为这种转变是由明治维新引发的。确实,根据麦迪逊以 1990 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日本的人均 GDP 在 1870 ~ 1941 年战前最高水平期间,以 1.92% 的复合增长率增长,而在 1820 ~ 1870 年,仅为 0.19%。^② 然而,农业就业人数的减少速度依然较低,这使农业就业人数在整个战前阶段一直维持在 1 400 万人的水平。^③ 因而,林文夫和普雷斯科特 (Hayashi 和 Prescott, 2008) 提出了“这一阶段的劳动力流动壁垒阻碍了从马尔萨斯型增长向索洛型增长过渡”的假说。

对于中国和韩国来说,如何刻画战前阶段的特征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根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 1870 ~ 1936 年间的人均 GDP 增长率仅为 0.09%,而人口增长率为 0.52%,仿佛典型的马尔萨斯现象将随之而来。^④ 直到 1952 年,中国的农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依然为 83.5%。韩国的人均 GDP 在 1911 ~ 1938 年间几乎翻番,但是当时的韩国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韩国的人均 GDP 水平急剧下降;直到 1953 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才恢复到 1911 年的水平。日本的人均 GDP 水平在 1941 年之后也急剧下降,直到 1956 年才恢复到之前的最高点。

① 毋庸赘言,在这一阶段很大比例的农民同时也参与各种各样的非农业生产活动,如为了家庭消费与市场交易的手工业制造。

② 根据 Ohkawa 和 Rosovsky (1973),表 2-1,人均 GNP 增长率在 1917 ~ 1931 年间为 1.64%,1931 ~ 1937 年间为 4.48%。

③ 农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从 1885 年的 64% 下降为 1940 年的 42%,但是在 1950 年又上升为 59%,这是因为二战结束后大量军人与平民由于食物与城镇工作的短缺从国外回到农村地区。

④ 我注意到一些最近的研究声称这些宏观数据所表明的薄弱的工业发展一定程度上有误导。例如 Eastman (1988, 第 95 页) 指出,在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末,布料的人均消费量几乎翻番。Rawski (1989, 第 70 ~ 71 页) 估计,1912 ~ 1942 年间,工业产出以年均 8.1% 的速度增加。Chang (1969) 之前的一份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估计,即 1912 ~ 1942 年间,工业增加值 (包括满洲在内) 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8.439%。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民国时期的 40 年间,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份额,由于增长的起点很低,现代工业与农村经济之间的联系不太紧密 (参见 Feuerwerker, 1995, 第 101 ~ 121 页)。根据 Perkins (1975, 第 117 页) 的估计,现代工业产出占 GDP 的比重在 1933 年为 7.463%,前现代制造业的比重为 12.4%。

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所造成的伤亡、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以及中国的内战与革命,都使我们无法将马尔萨斯标准机械地应用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东亚地区。因此,让我们暂且不刻画中国和韩国战前发展阶段特征(或者把这一阶段视为一个短暂的阶段),而是来看一看 20 世纪下半叶的数据能否更清晰地说明东亚的发展模式。我将宏观核算(macro accounting)应用于中国、日本与韩国的官方数据,根据人均 GDP 增长来源的不同模式试着划分出了连续的发展阶段。这些来源包括:(1)人口—经济变化,即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 $g(E/N)$;(2)结构转变, $g(S)$,包括劳动人口从第一产业(在下文标为 A 部门)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在下文标为 I 部门)的转移,以及 A 部门劳动者人均产出对于 I 部门的相对增长;(3)I 部门人均产出的变化, $g(Y_I/E_I)$,只要能可靠地获得 I 部门的资本存量数据,这最后一项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和资本—产出比变化。^①下表归纳了我的估算结果,并与麦迪逊对人均 GDP 增长率的估计进行了对比。^②

① 分解的计算方法如下:令 $Y = \text{GDP}$, $N = \text{人口规模}$, $E = \text{总就业人数}$, $Y_i = i \text{ 部门的产出}$, $i = A \text{ (第一产业)}$, $I \text{ (第二与第三产业)}$, $E_i = i \text{ 部门的就业人数}$, $i = A, I$ 由 $Y = Y_A + Y_I$, $E = E_A + E_I$, 因此

$$y = Y/N = E/N [E_A/E \times Y_A/E_A + E_I/E \times Y_I/E_I] = E/N \times Y_I/E_I [1 - \alpha\Delta]$$

其中, $\alpha = E_A/E$, $\Delta = [E_I - E_A]/E_I$ 令 $[1 - \alpha\Delta] = S$, 衡量农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下降的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如果 A 部门就业比重 α 下降, 以及/或者 MS 部门与 A 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 Δ 变小, 这一衡量值将会上升, 对于人均 GDP (y) 有正向影响。用 $g(\cdot)$ 表示增长率, 那么:

$$g(y) = [g(E) - g(N)] + g(Y_I/E_I) + g(S)$$

如果 $K_{MS} = \text{MS 部门的资本服务投入}$, $\theta_{MS} = \text{I 部门可用的资本份额}$, 因此 I 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以进一步分解为:

$$g(Y_I/E_I) = [1/(1 - \theta_I)] g(TFP_I) + [\theta_I/(1 - \theta_I)] g(K_I/Y_I)$$

② 麦迪逊对于中国人均 GDP 增长以 1990 年国际美元 (1990 International Geary - Khamas Dollars, I\$) 估计的结果看起来要比根据官方数据估计出来的要低。由于中国的省级政府官员将会因优秀的增长表现而得到嘉奖, 于是他们倾向于夸大产出增长率。人们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来纠正这一问题, 曹等人 (Cao et al, 2009) 回顾了这些研究, 并给出他们自己的研究结果。对于中国官方数据的仔细检查与调整, 请参考 Young (2003)。在计算表中的中国人均 GDP 增长过程中, 没有考虑 1989 ~ 1990 年的数据, 这是因为官方就业人数的估计数据有较大修订, 导致新旧数据之间出入达 7 200 万人之多。同样的, 韩国的部门产出在 1970 ~ 1979 年的官方数据可以根据当年要素成本得到, 之后可以通过当年价格得到。因此, 没有包括 1979 ~ 1980 年的增长率数据。

表 1 人均收入增长来源：中国、日本与韩国

	初始 Y/N (麦迪逊)	g (Y/N) (麦迪逊)	g (Y/N) (官方)	G (L/N)	G (S)	G (Y _t /L _t)	阶段
中国	1870 ~ 1938	530	0.09			M	
	1870 ~ 1951	530	-0.24				
	1952 ~ 1967	537	1.90	3.53	0.76	-0.58	0.77
	1967 ~ 1977	712	2.31	4.26	0.28	1.65	0.28
	1977 ~ 1989	895	6.13	8.12	1.44	3.47	3.21
	1990 ~ 1999	1 858	6.44	9.49	0.03	1.07	8.39
	1999 ~ 2008	3 259	—	9.32	0.30	1.60	7.41
日本	1880 ~ 1944	863	2.03			G	
	1889 ~ 1955	863	1.57				
	1955 ~ 1959	2 771	6.42	6.32	1.43	2.34	2.54
	1959 ~ 1969	3 554	9.58	8.13	0.91	0.98	6.24
	1969 ~ 1979	8 874	4.02	3.80	-0.41	0.62	3.59
	1979 ~ 1989	13 163	3.15	3.81	0.23	0.40	3.18
	1989 ~ 1999	17 942	1.41	0.91	0.10	0.28	0.53
	1999 ~ 2008	20 641	—	1.70	-0.34	0.10	1.93
韩国	1911 ~ 1944	777	1.64				
	1911 ~ 1963	777	0.82				
	1963 ~ 1970	1 186	7.39				
	1970 ~ 1979	1 954	9.14	7.81	2.22	2.29	3.29
	1980 ~ 1989	4 144	6.91	8.62	1.60	2.27	4.74
	1989 ~ 1999	8 027	5.12	5.47	0.51	0.11	4.86
	1999 ~ 2008	13 222	—	4.60	1.22	0.11	3.28

结合前面对战前日本的观察，后马尔萨斯阶段可以分为两个子阶段：第一阶段为国家工业化，特点是人均 GDP 的温和增长，伴随着中等程度的结构转变：1952 ~ 1977 年的中国与 1880 ~ 1956 年的日本；随后是第二个子阶段，在快速的结构转变与人口红利的影响下，人均 GDP 迅速增长：1977 ~ 1989 年的

中国与1955~1969年的日本。第一个子阶段对应着政府对工业积累的显著干预,所以我们称之为G阶段。^①

在第二个子阶段,人口因素,即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以及劳动力从A部门向I部门的转移,对人均收入的高速增长贡献了1/4或1/2。^②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1957)的一篇经典论文将横向与纵向的农业劳动人口比重下降概括为“经济增长的数量方面”。在东亚,这一转变相对于西欧被压缩到了很短的时期^③,并辅以之前的G阶段不断提高了生育率和不断下降的死亡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④。因此我将后马尔萨斯的第二个子阶段划分为K阶段,意指库兹涅茨过程。我们看到在韩国,K阶段被并入了G阶段。这是因为早在被殖民时期与朝鲜战争年代,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已经以较快的速度发生了。^⑤

① 在中国,1951~1978年,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6000亿元人民币,而对农业的国有投资为1760亿元(Wu, 2004/2005, 第117页)。然而,早期(20世纪50年代初期)I部门的人均产出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工业设备与人力资本管理的改进(参见Perkins, 1975; Feuerwerker, 1995, 第100~121页)。关于日本,寺西重郎(Teranishi, 1982)指出金融市场对工业增长提供资金的角色在G阶段并不重要,但是财政体制十分重要,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对非农业部门提供了实际上的补贴——通过税负的行业差异来计算,以及在1923年之后对非农业部门提供了正式补贴。在1928~1932年,非农业部门补贴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达到了31.8%。

② 我的核算方法可能低估了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因为它只衡量了劳动投入的直接效应。然而,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相对增长可能同时也促进了储蓄的增加,储蓄的增加可以提高资本劳动比,提高人均工业产值。Higgins和Williamson(1996, 1997)估计,东亚13.6%的储蓄率增长几乎可以全部归因于抚养比的下降,而这使得积累率提高了3.4%,人均GDP增长了1.5%。

③ 根据库兹涅茨(1957)的观点,法国花了84年的时间才将农业就业比例从1866年的52%降到1950年的33%。

④ 日本在1900~1947年的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维持在30%多的较高水平。然后在1990年之后平稳地下降到了不足10%。中国在“大跃进”导致人口下降的情况下,粗出生率迅速增长到了1963年的40%,之后直到1970年都维持在30%以上的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即使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之前,粗出生率也平稳地下降到了20%以下。

⑤ 在殖民主义阶段,由于日本享有土地所有权的权益以及稻米价格的相对下降,再加上在韩国之外有更好的赚钱机会,传统农村的凝聚力削弱了。根据Kwon(1977)的权威研究,到1940年,14%的朝鲜族生活在日本与中国东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大约3/4在日本工作的人)在二战后回到韩国,大多在城镇地区安顿下来。根据Kwon的估计,1949~1955年农村—城镇净流动人口约为650000~750000人,而1950年的总人口为2000万。在江原道(Kangwŏn Province),21%的人口从农村地区流入。在1963~1969年间,此时官方就业数据是可得的,A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已经从62.9%下降到了50.2%。然而,在这一阶段,基于市场价格的部门产出的官方数据还是无法获得(至少对我来说如此)。

在 K 阶段结束之后, 人均 GDP 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取决于经济稳定提高 I 部门人均产出的能力, 尤其是对 TFP 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我们称这一阶段为 H 阶段, 因为它是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日本看似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之间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这一转变, 但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却没能维持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 在 21 世纪的头 10 年出现了细小的逆转。诚然, 这其中涉及到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误, 但是正如下文我要提出的, 为应对急剧的人口转变而做出的错误制度安排为人均收入增长投下了阴影。另一方面, 韩国在过去的 20 年间 (1989 ~ 2008) 成功维持了 I 部门较高的人均产出水平。20 世纪头 10 年劳动参与率的显著提高部分是由于战后第二代婴儿潮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但同时也反映了生育率下降而导致的抚养比的急剧下降, 这是 H 阶段在快速增长背景下的典型现象。^①

从 1990 年至今, 中国人均 GDP 的持续高增长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失去了人口红利的支持, 但是在 21 世纪的头 10 年结构转变依然贡献近 1/4 的人均 GDP 增长。结构转变的贡献是否可以持续下去成为当今中国经济—人口争论的核心议题。^② 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说, 由 K 阶段向 H 阶段的转变是以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低于 20% 为标志的。中国在 2009 年, 沿海省市的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为 26.4%, 内陆省份为 46.3%。如果将 20% 作为一个经验性标准, 沿海地区很快就要跨过 K 阶段, 或者可能已经在发生, 但是对于内陆地区来说则还尚待时日。顺便提及, 沿海省市 2009 年的人均 GDP (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 为 10 616 美元, 与世界银行计算的世界平均水平几乎持平, 而内陆省市 (为 4 755 美元) 则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55%。^③

① 1985 ~ 2005 年, 15 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超过了 10%。

② 这些争论常常围绕着中国经济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而展开。但是用这种方式来说明问题似乎有些误导, 因为刘易斯模型机械地综合了两个不同的模型: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古典模型和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新古典模型。这同我们之前简要介绍的近年来的标准分析方法是不一致的, 因为它忽略了那些看起来可能成为剩余劳动力的农民在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参见 Jorgenson (1967) 赞成理性选择模型而对刘易斯理论的批评。

③ 利用中国的官方数据, 对于沿海省市 (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与内陆省市 (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的划分是根据省份之间的人均生产总值与农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的。这一分析发现了唯一一个异常值是内蒙古, 内蒙古的农业就业人口比重是相当高的 (48.8%), 但是采矿业产出使该省的人均生产总值同沿海省市相当, 所以该省在计算中被剔除了。人均产出转化美元单位是根据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 (PPP) 转换率计算的。世界银行估计的世界平均水平为 10 691 美元。

中国看起来依然可以享受 I 部门人均产出的强劲增长。然而,表中给出的数据可能有某种程度的高估,因为如蔡昉和王美艳(2007)所讨论的,官方数据可能低估了 I 部门的劳动投入水平(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结构转变的贡献率可能比表中所表示的更高,因为 A 部门的人均产出有着相对更高的增长率)。在没有可靠的资本存量数据的前提下,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 I 部门的人均产出增长多大程度上归因于 TFP 或人力资本投资,而这些数据在公共领域依然是不可得的。然而,一些学术精深的著名学者估计出的 TFP 数据已经发表,曹等人(Cao et al, 2009)对此做了较好的梳理。根据他们自己的基于产业的研究, I 部门的 TFP 增长率在 1982 ~ 2000 年间为 1.8% (第二产业为 2.1%, 第三产业为 -0.3%), 人均产出的增长主要源于资本积累而不是 TFP。

展望未来,三个东亚经济体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那部分人口将会显著减少。日本的平均寿命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但是其潜在劳动力(15 ~ 65 周岁)所占比重在 21 世纪中叶将下降到仅占总人口的一半。中国的这一比例在 2010 年就已经达到了峰值,甚至其潜在劳动力的绝对规模也将于 10 年后开始萎缩。韩国的潜在劳动力比例将于 2015 年达到最高点(73%),但是之后它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将比日本更快。^①

东亚发生的这些剧烈的人口变化,源于 H 阶段的低生育率和这一阶段医疗保健与生活舒适度提高所带来的平均寿命延长。此外,更长的学校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增长,降低了年轻人群实际的工作参与率。在东亚,这三种趋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这是因为由 G 阶段向 H 阶段的转变被高度压缩了。只要人均产出进一步增加,各种力量的平衡能够提高劳动参与率并扭转生育率的下降趋势等等,人均产出也许依然可以持续增长。但是,如果技术与人口特征的这种发展趋势从根本上要求人们以新的方式参加社会博弈,那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即后人口转变阶段,简称为 PD 阶段。对于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趋势的普遍程度仍存在争议。然而,正如事实所表明的,社会福利体系(social entitlement system)以及相应的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所有发达经济体需要重视的议题,东亚国家可能在“新的人口转

① 据预测,到 2015 年,韩国 15 ~ 65 岁人群所占比重将达到 73%。将在接下来的 35 年里下降到 55%,而日本经历同样程度的人口下降则需要 50 年。